七日談（廣東篇）

看不見的烽火線與「文化心」的歸途

梅 毅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夜，香港離島淺灣，一艘沒有燈火的小漁船隨浪浮沉。艙內，茅盾夫婦蜷縮在一起，警覺地望向黑黢黢的海岸線。船夫突然熄滅油燈，低聲說：「屏息！」隨後，日軍巡邏艇的引擎聲由遠及近，緊接着，一束探照燈掃過船篷，光斑在茅盾蒼白的臉上停留數秒，又移向黑暗深處。

此刻，鄒韜奮、柳亞子、何香凝等八百多名中國文化精英，他們的命運亦懸於一線。十二小時後，這艘不起眼的小漁船，將載着中國文學巨匠駛向九龍紅磡。這場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行動，歷時數百日，行程萬里，穿越日軍三重封鎖線，八百餘人全員脫險，無一人被捕犧牲，悄然改寫了戰後中國文化界的政治地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硝煙中，日軍太陽旗取代了港督府的米字旗。一百六十萬香港人度過了一個「黑色聖誕節」，而更危險的陰影籠罩在茅盾、鄒韜奮、何香凝等八百餘名文化精英頭上。彼時香港匯聚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進步文化力量：鄒韜奮復刊《大眾生活》痛斥國民黨消極抗日，茅盾主編《筆談》聲討分裂行徑，夏衍組建「旅港劇人協會」以戲劇喚醒民心，何香凝、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發表反蔣宣言……這些文化人多因以筆為槍遭國民黨迫害，避居香港繼續抗日救亡運動，此刻卻成日軍重點搜捕對象。日軍特務機關「大東亞共榮圈」在《南華日報》刊出啟事：「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共建大東亞」，在影院打出幻燈片「邀梅蘭芳、蔡楚生赴半島酒店會談」——名為「邀請」，實為誘捕。日軍限令文化人限期報到，「違者格殺勿論」，街頭失蹤人口逾四十萬。

在日軍大肆搜捕愛國者、文化人的陰影下，一批中國文化界的靈魂人物被困孤島。消息傳至延安窰洞，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神色凝重：若任由這批文壇巨擘落入敵手，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浩劫，更將重挫民族抗戰的脊樑！周恩來連發三封急電至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不惜代價，火速營救！」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臨危受命，一場代號為「省港大營救」的行動悄然啟動。一張由黨組織、地下交通站、香港本地力量與新界宗族勢力共同編織的「生命之網」，在日軍眼皮底下悄然張開。

營救首要在「尋人」。從日軍重兵控制的香港，抵達廣東游擊區，不僅要穿越多重封鎖線，更要應對嚴密的身份盤查。在日軍崗哨遍布的街頭，香港地下黨成員潘柱、黃施民等小組成員憑本地人優勢，以店舖工人、黃包車夫等身份為掩護，穿梭於槍炮廢墟間，挨家挨戶聯繫、核對文化人名單，避開七十六號特工的眼線，將信息壓縮在密寫紙條中送達指揮部。隨後，他們利用茶樓、當舖等場所建立「無形中轉站」，安排喬裝、發放假證件，將八百餘人化整為零，安置在佐敦花園街、上海街等十七處秘密據點。一張無形的安全網絡在敵人心臟鋪開。

陸路轉移需穿越日軍重兵把守的香港新界地區，尤其是鄰近九龍腹地的元朗、錦田一帶，而本地宗族勢力成為意想不到的關鍵支撐點。元朗楊家祠，這座供奉着楊氏祖先的家祠，在族長楊鐵如的默許甚至協助下，成為重要的中轉休整站。這座不起眼的祠堂，每日備下食物、飲水、臨時住處，接待途經的文人；甚至打探日軍動向，附近村民站崗放哨，用客家諺語作為識別暗號。

沙頭角石涌凹村的羅家大屋展現出另一種保護力量。在愛國士紳羅雨中及其後人的主持下，調集門生故舊為營救護航，在險要處設置秘密觀察哨，為疲憊的文化人和護送人員提供了難得的避難所。

◀香港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的適廬（楊家祠）曾是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

真正的生死考驗在穿越大鵬灣到廣東游擊區的水路上。日軍的巡邏艇在夜間如同幽靈。依託西貢漁民船隊和短槍隊護航，一條從西貢、經大鵬灣到寶安的海上通道被打通。二十艘槽仔船組成編隊，船頭掛漁網偽裝作業，而文化精英們則蜷縮在窄小的帆船、小艇船艙裏，連咳嗽都必須竭力壓制。遇日軍巡邏艇，老船主陳阿水故意撒網纏住螺旋槳，為撤離贏得時間。茅盾、胡風等人多經此道撤離。他們在香港西貢登船，在短槍隊護衛下夜渡海灣，次日凌晨抵達安全區。

寶安縣白石龍村，這個不足二百人的小村莊，見證了文化精英的「重生」。游擊隊員用竹片茅草搭起「茅寮招待所」，將文化人分散安置於羊髻山、深坑等密林中。胡風在油燈下教小戰士「五四運動史」，經濟學家沈志遠講政治經濟學，漫畫家丁聰為游擊隊《東江民報》畫漫畫，鄒韜奮為游擊隊《新生活報》題寫報頭並撰社論，戲劇家于伶創作《長夜行》歌頌營救者。這些曾被國民黨視為「異見者」的文化精英，在生死與共中重塑政治立場。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當最後一批文化精英歷盡艱辛安全抵達桂林，這場震撼人心的營救行動，勝利收官。行動結束後，這批文壇精英在中國抗戰文化戰線大放光彩。鄒韜奮在蘇北創辦《抗戰周刊》揭露皖南真相，茅盾執筆力作《霜葉紅似二月花》，夏衍將營救經歷寫成劇本《人間有情》，在香港知識界引發巨大反響。當一九四五年國民黨以高官厚祿為誘餌，廣邀社會賢達參加偽「國大」時，茅盾、鄒韜奮等當年被營救的文化名流集體公開表態拒絕。茅盾更是直言：「八年來，誰與國人共甘苦？誰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我的答案早已寫在那條離開香港的路上。」一九五〇年代，一項權威統計顯示：經此營救的文化精英中，超過百分之八十五在建國後投身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司徒慧敏籌建北京電影學院、戈寶權執掌社科院外文所，印證此次營救是一次超前的、成功的「人心統戰」。

八十三年前那場千里奔襲，創造了「零傷亡營救八百人」的傳奇，它的傳奇不在硝煙濃度，而在人心厚度。它證明：最堅固的防線，不是鋼筋水泥，而是以文化認同為磚、民族大義為漿砌成的人心長城。而今，白石龍紀念館牆上那句「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恰是歷史最深刻的註腳：統戰的藝術，從來不是征服而是共情；信仰的建立，永遠始於拯救生命的溫度。

杜尚別掠影

市井萬象

杜尚別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也是塔吉克斯坦的經濟、文化中心。圖為人們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別參觀索莫尼紀念碑。

新華社

再訪「勃老」，感受父子情深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時隔一年重返布魯塞爾。此次住的酒店又距離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長眠的沙佩勒聖母教堂（Notre-Dame de la Chapelle）不遠，決定再去和大師「敘個舊」。

一五六三年，老彼得・勃魯蓋爾從安特衛普遷居至布魯塞爾。他在沙佩勒聖母教堂迎娶了老師彼得・科埃克・凡・阿爾斯特（Pieter Coecke van Aelst）之女、芳齡十八歲的梅肯（Mayken Coecke）；兩個兒子小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和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隨後在布魯塞爾呱呱墜地；著名的季節組畫也是在此完成……一五六九年九月九日，「勃老」因病去世，安葬在其大婚的沙佩勒聖母教堂。這座有着哥德式外觀和巴洛克鐘樓的恢弘教區主教堂，意外地在不足十年內見證了大師的婚喪嫁娶。

無獨有偶，一年前到此就是陰雲密布，此行也未能破例。邁進教堂，又一次體驗了「包場」。「勃老」之墓在進門後右手邊不遠處的禮拜堂內。要知道，當年能夠葬進教堂內且擁有獨立小禮拜堂的絕非等閒，畢竟連倫勃朗、維米爾等今天在西方美術史中舉足輕重的尼德蘭巨匠都未曾有此待遇，還是如此「黃金地段」。待了近一小時，往來的遊客沒超過十個，更無人在意這裏長眠着誰。時過境遷，無人問津的「勃老」如今倒也樂得清靜。

去年初次到訪時由於下午要趕飛機，行色匆匆地拜謁大師便離開了。此次重返時間頗為充裕，我有機會在大師安息之地旁靜靜坐會兒。牆上帶有「勃老」肖像的青銅紀念牌是一九三四年打造的，這位偉大的尼德蘭畫家則長眠於地面刻有其肖像的石磚下。上面還有一段拉丁語的銘文，「紀念老彼得・勃魯蓋爾，一五六九年九月九日，他創作了許多作品，這些畫作絕非易事。當他睜大眼睛觀察世界，與同伴探討問題時，他的畫作構思才更顯精巧。」這段頗令人深省的文字，其句式不由得讓我想起了意大利文藝復興作家、紅衣主教佩特羅・本博（Pietro Bembo）為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寫的墓誌銘：「這裏長眠着拉斐爾，在他生前，大自然唯恐被他超越；他去世後，大自然也隨他逝去。」一五二〇年拉斐爾英年早逝時，「勃老」尚未出生。一位是奠定和諧典雅審美的意大利盛期文藝復興三傑，另一位是畫中充滿世俗煙火氣的北方文藝復興巨匠，兩位壽數相近且改變西方美術史的天才，連墓誌銘都異曲同工。

在十七世紀，沙佩勒聖母教堂甚至以擁有三幅魯本斯爵士及其工坊的真跡引以為傲。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期間，「勃老」次子老揚・勃魯蓋爾特邀摯友魯本斯爵士為其父母紀念碑前繪製了一幅《基督將鑰匙交予聖彼得》，就懸掛在面朝父親陵寢的牆上。遺憾的是，真跡於一七六五年被賣掉了，買家還很「貼心」地替換上了一張高仿。今天能在教堂內看到的便是複製品，原作如今掛在兩個月前我才到訪過的柏林畫廊內。畫中耶穌基督授予聖彼得的兩把鑰匙，在西方天主教中代表至高無上的宗教權利，也代表了人們對天國的所有美好想像。時至今日，梵蒂岡博物館的logo就是由這兩把交叉的鑰匙構成。金匙開啟天堂之門，銀匙代表人間管轄。「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想，老揚・勃魯蓋爾特邀摯友魯本斯創作此主題供奉在生父安息的禮拜堂內，其寓意想必是希望先父在天堂能繼續肆意地施展其藝術才華吧。

◀布魯塞爾沙佩勒聖母教堂內的魯本斯作品《基督將鑰匙交予聖彼得》（複製品）。作者供圖

在魯本斯複製品下方的紀念碑上，刻有幾排描金的拉丁語銘文。「致老彼得・勃魯蓋爾，這位勤奮嚴謹的畫家，其藝術之美無與倫比，大自然這位萬物之母都對他讚不絕口，經驗豐富的藝術家們對他羨慕不已，模仿者們徒勞地試圖效仿。同時，也獻給他的妻子梅肯・科埃克。老揚・勃魯蓋爾將此獻給父母，致意最美好的祝願。」這段簡短的文字，寄託着兒子在父母雙雙故去後對他們的祝福與哀思。雖然他委託魯本斯表達的「心意」現已在千里之外，但這段銘文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由我讀來仍倍感情真意切。拜謁大師的初衷，除了「沾仙氣」的渴望，還有那些物是人非後殘存的無聲慰藉，彌足珍貴。

地質的廣場（下）

自由談

楊小波

完整繞圈走走看看，發現西四十字路口西南角這塊約一百五十步長、一百二十步寬的長方區域，已被打造成獨具匠心的專題地質文化廣場，並且分區域作了精心的功能設計。

其中，最靠近西四十字路口、由阜成門門內大街和西四南大街交角圍出的約九十步長、九十步寬的區域，稱為「地質科普廣場」，是整個廣場的主體部分。

從北邊「地質科普廣場」地上標牌旁走入，兩側裁剪整齊的冬青綠牆，一路圍護着斜長小徑蜿蜒前去，背後綠樹濃蔭密布。腳下光滑的石板路面由三部分組成，中間的寬路面由菱形石板密縫組成，兩邊的窄路面由長方形石板組成。左側的長方石板路面上，依不同的距離，釘着十一塊正方銀色金屬牌，標着不同的地質年代。踏上這條不長的石板小徑，彷彿走進那個遙遠的時光隧道。於是，在不足百步的石徑上，我就從遠古走來，先後跨越了「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奧陶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炭紀」「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古近紀」，直到圓形中心小廣場。

小徑右側的長方石板路面上，則相對應釘着三塊正方銀色金屬牌：「古生代」、「今生代」、「新生代」。

小徑兩側，由古及今，由「凹」形冬青牆三面圍護，還交錯擺放着八塊精美礦石標本，基座金屬標牌上分別寫着：「麻片岩」、「螢石」、「釩鈦磁鐵礦」、「硅化木」、「結核」、「銅鎳硫化物礦石」、「竹葉狀灰岩」、「金伯利岩」。

其中的「竹葉狀灰岩」棕色岩體光滑表面，布滿淺白色的竹竿竹葉，如同着色加密版的鄭板橋竹畫，令人稱奇。金屬牌簡介：「因截面礫石形似竹葉而得名，形成於潮汐波浪活動頻繁的海灘地區，主要用作建築飾材和工藝品原料。該標本產自山東萊蕪。」

從東北角斜着進入，則彷彿選擇了個歷史人文的切入角度。兩邊圍護小徑的冬青綠植內側，又加鑄了低矮後傾的紅繡鐵牆，似兩側堅實的防波堤，護送長江大河緩慢起伏而去。

入口處右側設置一塊大方石台，台面上鑲嵌着一組精美的街區銅雕作品。中間是面向東南西北圍起的四個牌樓，分開四塊房屋縱橫的居民區。旁邊的「西四牌樓」說明：「西四，元代為羊角市，明永樂年間，於十字路口四面各立一座三間四柱三樓沖天式牌樓，東曰『行義』，西曰『履仁』，南、北曰『大市街』。因四座牌樓位居皇城之西，故稱西四牌樓，簡稱西四。一九五四年西四牌樓拆除，地名沿用至今。」

從正東面進入，則遇到一個圓形小廣場，圍種着七棵銀杏樹、兩棵松樹、兩棵梅樹。圓形的六圈石板地面，圍着圓圈冬青綠植，綠植圍護的圓形碎石空地中間，豎起一人多高的二層黑石方體基座，上面端塑着人物胸像。背面黑石基座上，金色的隸書密密麻麻記述着他的生平，正面黑石基座上，是「李四光」三個金色手書大字，下面一行數字：「1889–1971」。

作為我國著名的科學家、卓越的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愛國者、新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李四光為祖國建設作出了傑出貢獻，被譽為中國科學界、知識界的一面旗幟。

塑像的李四光，目光深邃，炯炯有神，堅定地望向右前方。在他塑像身後的圓圈地面旁，對稱擺放着兩塊礦石標本，一塊是咖啡色的「冰川擦痕」，「是指在冰川運動過程中，冰川攜帶的岩石與基岩相互摩擦形成的條痕，可指示冰川的運動方向。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先生根據發現的冰川擦痕確立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理論。」另一塊是「佘太翠」，「因產自內蒙古烏拉特前旗佘太鎮，又頗像硬玉翡翠而得名，是由粒狀石英組成的石英岩，因含鉻雲母而呈綠色。可作為觀賞石材或玉石飾品材料。」

地質科普廣場的旁邊，便是地鐵西四站的出口，站口房頂牆面也以菱形構圖呼應着地質廣場的文化風格。

中國地質博物館門口張貼着一張巨幅照片：白雪皚皚的珠穆朗瑪峰，嵌入湛藍的天空，峰頂處被吹散的雪粉，飄向左邊，不知將落何處。

站在西四十字路口路邊西望，左邊是宏闊的博物館，右邊是安靜的廣濟寺，前面是隱約的白塔。

世界之大，品類之盛。勘探不易，豈能有止。